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戴 豪良 第3期笹川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室 教授

1987年至今，已经有二千多名中国医务工作者通过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从日本进修回国，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内医科大学或各级医疗机构的中坚力量，活跃在各个专业领域。笹川医学奖学金归国同学所开展的工作及其发挥的作用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医学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医疗系统与西方国家交流得比较多，有不少医院过去还与天主教会有一定的关系，一直延伸到后来，人际关系或者提供的教育经费资助途径都比较丰富。因此，医学生毕业后的深造，大多数是选择到美、英、法等国家进修或攻读博士学位。此外，上海学生从小学开始，接受的外语教育，主要是英语（除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分是俄语）。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地区熟悉日语的人也比较少，中日两国医学界的交流也不多，所以，希望到日本去进修学习的人不是很多。而实际上，中日两国同处东方，历史上的文化和医学交流远比西方国家要多，尤其在文化和哲学思想方面有不少共通之处，所以，加强中日两国的文化和医学交流将对医学发展及提高两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促进作用。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实行，为此提供了可能。

我所在的中山医院，原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医院内有不少留学归国学者，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美英派，院内通用的外语是英语，即使是日本韩国学者来访，交流的语言也是使用英语，医院内没有一个略懂日语的。

我是在就读研究生期间，以第二外语选读了“日语”半年（每周二个学时，即一个半小时，总共学了四十个学时，约三十个小时），以后在业余时间通过广播电台继续听日语讲座。在1988年，通过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来到筑波的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开展“中医中药与微量元素”相关课题的研修学习。期间除了专业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外，还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

1989年10月份回国后，正遇上日本顺天堂株式会社与中山医院合作科研事项的实施。虽然是药物研究而非我所从事的临床工作，因为专业相近，而且在语言上有利于交流，所以医院领导希望我参加这项合作研究。在三年的合作过程中，对于双方工作上的交流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尤其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和书面文件的交流方面加快了沟通速度，这是一般语言翻译人员无法做到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此，以后医院内有任何与日本方面交流的活动，大多希望我去参加。

由于与日本相关单位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医院内有不少青年医护人员想要学习日语，希望我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基本上是属于自学性质的，不是正式日语专业的学生，所以我要找一个正宗的日语老师。那时，中山医院院报编辑室有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的工作人员，经过我的动员劝说，他倒是愿意担任医院业余日语培训班的老师。接下来，就是正式向医院院长提出建议开办日语学习班。考虑到与日本交流项目和鼓励青年人学习的热情，医

院领导正式同意举办这个学习班，而且是连续办了三年。为了减轻那位专业出身的日语老师十分紧张的工作压力，在他的指导下，我也担任了一部份的教学工作。共有五十名左右的医护人员参加了这个日语启蒙学习班，也通过他（她）们以后自己的努力，医院内已经有不少医护人员到日本进修学习。当时的一位青年骨科医师在日语启蒙学习后，通过交流，曾到日本有关医院学习进修，现在已经是“人造骨”相关课题的专家。

日本的汉方医学与中国的中医学有一定的联系，与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也有学术交流的意愿。我曾是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非常愿意推动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的交流，为此，我促成了一次在上海举行的“中日活血化瘀研究学术交流会”，对中日双方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由于上海地区熟悉日语的医护界人士不多，我还多次应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日“皮肤科”、“血液病”等学术交流活动，为活动的举办做过筹办、论文集编辑、现场翻译等工作。

除了在日本研修时的指导老师外，我在日本结识的不少朋友也到中国来访问和旅游，我都陪同进行介绍和讲解，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 and 熟悉中国，并且还加深了友谊。在我研修的日本研究所内有一位单身员工，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兴趣，在我研修的一年时间里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曾多次到中国来旅游，并在其间认识了我的一位从事麻醉士工作的女学生，现在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从研修归国后的这些年里，我还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到日本九州的旅游，我的一些亲戚和朋友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多次参加了到日本的常规路线游和北海道的冬季特色游，他们还想下一次搭乘游轮到西日本的京都，大阪、神户去旅游。

我想，笹川医学奖学金归国学生不仅要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方面，还要在中日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方面，起到一个更好的纽带和桥梁作用。